

[现代文学]

20 世纪乡土想像中启蒙与现代性的悖论

禹建湘

(中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关键词:乡土想像;启蒙;现代性

摘要:现代性肇始于启蒙。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乡土想像中,启蒙思想一方面促发了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的强烈诉求,另一方面,同样在启蒙的引导下,知识分子瞥见了现代性的种种负面效应,从而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反思,这种悖论,正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追求与犹疑的双重态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1)04-067-5

The Paradox of Enlightenment and Modernity in Native Soil Imagin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YU Jian-xi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

Key words: native soil imagination;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Abstract: The modernity is origin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native soil imagination in China literature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one hand have fueled strong demand for the modernity through the enlightenm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tellectuals have caught a glimpse of all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modern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enlightenment. Thus the intellectuals have reflected on the modernity. This paradox has been displaying the intellectuals' dual attitudes to hesitating and pursuing the modernity.

在 20 世纪的现代性进程中,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最根本性影响的是启蒙思想,启蒙思想使人们对于历史的演绎有了重新认识,于是,启蒙就成为了 20 世纪以来文学中乡土想像的时代语境与运行机制。

自鲁迅开始,启蒙精神就一直贯穿于乡土想像之中,因为现代性就是肇始于启蒙,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对乡土的启蒙来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但当现代性给人类带来负面效应后,对于启蒙所带来的现代性的质疑也就发生了。启蒙在 20 世纪以来的乡土想像中担负起了双重的任务,知识分子既要借助于启蒙引导中国走向现代性社会,又要运用启蒙的怀疑精神,引导人们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乡土想像中对启蒙的诉求与反思这种矛盾冲突,表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追求与犹疑的双重态度。

一、现代性肇始于启蒙

目前,对现代性的理解有两个最基本的层面,一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态度,一种方式,而另一种认为现代性是时间性的。比如,福柯从康德有关启蒙的文本中看到了现代性是一种态度和方式,他“把现代性想像为一种态度而

不是一个历史的时期”。⁽¹⁾^(P429) 比如汪晖对现代性概念作词源学的考察之后指出“即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²⁾^(P2) 在当前,关于现代性的两种层面的理解,都在某种程度上印证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现代性也许是时间意识与现实态度相结合的一种新的思想方式。

当今,人们处在现代性的包围之中,也就是说,不管现代性给人类带来多么大的弊端,不管现代性的负面影响有多大,但“作为一个总是处于迅速变化状态的世界的公民,我们总是身处现代性之中。”⁽³⁾^(P116) 既然我们不可避免地生活在现代性之中,我们就要追问一下,现代性起源于哪里? 美国汉学家艾恺认为“现代化的根源肇始于‘启蒙运动’。”⁽⁴⁾^(P8)

把现代性归根于启蒙,在中国同样适用。王一川说:“所谓‘现代性工程’是指‘中国古典性文化解体以后,以西方话语规范为参照系,而重建中心文化的启蒙与救亡交织的话语实践’。”⁽⁵⁾^(P33) 张颐武也说“对于中国语境而言,‘现代性’意味着以西方话语为参照的‘启蒙’与‘救亡’的过程。”⁽⁶⁾^(P104-109)

(收稿日期): 2011-07-03

(作者简介): 禹建湘(1970-),男,湖南双峰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文学批评和文化传播。

1795年约翰·亚当·贝克发表《启蒙导致革命吗?》一文,他说“作家,出于一种责任感而促进革命:因为他们应该照亮人类的理解力,激活人类的道德情感,就人类的责任和权利对人们进行启蒙,善意培养和丰富他们读者的心胸。”^{(7)(P233)} 贝克对于作家的这种期待,在20世纪的中国的一些作家那里,得到了某种应和,正是基于对民众的启蒙这一诉求,自五四以来,一些作家自觉把眼光投向底层,尤其是乡土世界,从而开辟了一种乡土想象的启蒙之路。

然而,我们意识到,启蒙传播真理,使人类从愚昧走向文明,使现代性的社会得以产生和发展,但当启蒙走到一定阶段,它的负面的东西也就显露出来。吕迪格·比特纳认为既有支持启蒙的理由,因为“启蒙特别承诺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自由”^{(7)(P366)}。也有反对启蒙的理由,因为启蒙通过“铲除一切神圣的痕迹而让生活丧失了人性”。^{(7)(P363)}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更是看到了启蒙的悖论,启蒙运动试图把这个世界从神话和迷信中解放出来,使这种努力已经陷入到了一种致命的辩证法——启蒙本身返回到了神话,启蒙运动本身“已经包含了现今随处可见的倒退的种子。”^{(7)(P29)} 的确,当启蒙把理性上升到一个绝对高度时,就预示着启蒙走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当理性上升为绝对理性而达到最高的自主性时,就已经预示了理性的危机和最终瓦解,这时的启蒙也随之产生了危机。

启蒙导致了现代性,在追求现代性的旅途中,人们总是能看到启蒙的光辉在闪耀,当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接受着西方现代性思想时,启蒙的光辉也在那个时刻照亮了知识分子的心灵,于是,对于怎样拯救中国,怎样强国立民,知识分子有了理性的自觉。启蒙成为了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的一把智慧之匙。乡土中国,也开始沐浴着启蒙的光辉,启蒙性于是凸显在一个世纪的乡土想象中。与此同时,启蒙的弊端也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逐渐显露出来,于是,关于启蒙的所有积极与消极的东西必然在乡土想象中呈现出来。启蒙在20世纪以来的乡土想象中担负起了双重的任务,知识分子既要借助于启蒙引导中国走向现代性社会,又要运用启蒙的怀疑精神,引导人们对于现代性的反思。

二、启蒙促发乡土现代性诉求

启蒙萌发了乡土的现代性诉求,中国需要现代意识来疗救乡土,达到变革中国政治结构和经济方式,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尤其是20世纪早期,最早接触到现代性的知识分子,强烈地感受到了乡土中国落后的根本在于民众的愚昧。启蒙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可以说,中国文学对乡土的启蒙,是中国文学“现代性”根本性体现之一。

中国近代以来,随着殖民经济的深入和连年的兵乱、灾荒,使传统中国的乡土经济在20、30年代处于崩溃的边缘,依靠土地的中国农民在天灾人祸双重压迫下被迫流离失所,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得不来到城市讨生活。从那时开始,中国的乡土开始与城市发生了直接的联系,中国的城市出现了真正来自乡土的流浪者。由于西方文明的侵入,

中国古典城市开始了现代转型,随着现代形态的城市在中国出现,马克思所说的城乡对立在中国也逐渐形成了。“而就在这样的城市,客居着一批从‘乡下’来的知识者。他们可说是当时的城市(主要是北平)人员构成中唯一的异质人。”^{(8)(P20-25)}

在很大程度上,城市与乡土的对立,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从乡土走到城里来的知识分子,对这种对立了然于心,反映在他们的乡土想象上,就是表现了城市与乡土的激烈碰撞和深层纠葛。从乡土走出来,在城市受到现代性的浸染,然后又用现代的启蒙目光来审视国家民族,审视乡土的弊病,是现代许多知识分子的一条思想轨迹。20世纪20年代始,有人在提到“乡土文学”的形成时说:“在当时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集结了很多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青年,他们大多来自乡村,‘五四’以后又吸收了城市文化。因此,母体文化和外来文化,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在他们的身上第一次相融合,使他们产生了文化的困惑和生存的痛苦。这种困惑和痛苦写成文学作品,就是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乡土文学’。”^{(9)(P42)}

鲁迅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鲁迅从小乡镇走出来后,他的思想就随着在各个城市的迁移而不断深邃。在南京求学时期,鲁迅受维新思潮和西方新学的影响,开始把故土家园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变革维新、富国强民的思想逐渐形成。戊戌变法的失败,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八国联军的入侵,这些沉重的历史事件使鲁迅壮怀激烈,忧心如焚,激起了他强烈的爱国情绪,这些新生的爱国、救亡的有意识的思想与原有的对于故土的热爱和憎恨的无意识因素并存共长,不断冲击煎熬着鲁迅的心灵。留学日本时期,鲁迅受到了革命氛围的强烈感染,对家与国的思考更加深刻,救亡图存的政治立场进一步确定。于是,潜藏于无意识深层的乡土情结终于在民族自强、唤醒民众的启蒙觉悟下,在弃医从文,文艺救国的实际行动中,被激活并且坚固起来。鲁迅最终远离乡土,在城市立足后,他对城市的观察更为细致,他发现,城市中不但充满着乡土的封建糟粕,而且充满着随殖民而生的享乐主义色彩,城市中的各种丑陋现象,使这个来自乡土的知识分子对城市最初的瑰丽梦幻变成梦醒后的失落与痛苦,迫使他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鲁迅在1933年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明确表明了启蒙思想对他创作的影响,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0)(P482)} 鲁迅发现自己并不属于城市这个花花世界,而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乡土羁旅者,成为离开故土后又被城市拒绝的“无地彷徨”的边缘人。他只好挣扎于都市,体味着城市生存环境对他造成的强大的心理压力,这便激发了他重新寻找精神支柱的愿望。他自然会想到“乡土”这块祖传的精神避难所,即使自己没有乡土家园可回,也要再造一块这样的“心理乡土”。这样,就造成了鲁迅创作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他身居城市却几乎不涉及城市生活的描写,他始终把乡土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但是,透过鲁迅的乡土描写,我们发现,他对乡土的表达,已融入了一个带有现代意识的城市知识分子的思想,他在乡土的叙述中,已自觉地把现代性的启蒙思想传达出来,正如有人说

的“鲁迅虽然差不多没有写过都市生活,在多数作品中,却始终是以前卫的城市人的眼光去看取‘乡下人’和‘乡下事’的,这些即说明了他写小说时已经有了城市人的装备、思想的、经验的。说到底,他的乡土小说,是一种由现代人思想烛照的农村写真。”^{(11)(P110-115)}可以说,鲁迅以乡土为基点的创作内驱力,是鲁迅的乡土情结与批判国民劣根性、反封建、“立人”等启蒙思想内容相结合的一种意识,他的乡土想象,是一个启蒙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命运如何进行现代化的一个深刻思考。

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或许并不一定每个人都自觉标榜过“现代性”,但城市里的一切终于让他们感受着西方文化的魅力,给20世纪的乡土也烙上了现代性的印记。有论者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城市,也便没有了他们的乡土小说。那时的乡土小说标志了一种新的文化价值,普遍的人道主义和程度不等的启蒙主义动机,推动它们的创造者用俯瞰的眼界凝视各自的故土家园,实现着‘市’对于‘乡’的超越,展示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比较结实的城市对农村的文化辐射。”^{(11)(P110-115)}

自鲁迅在他的乡土想象中,以启蒙的姿态对乡土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剖析后,这一传统就一直延续下来。有人说“可以这么说,鲁迅之后,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中国乡土小说已形成了某种模式,这种模式就是:以乡土小说的形式来表现时代或社会的重大主题。在这里,乡土风情的描写仅被作家当作一种创作的方式和手段,或只是为活动、故事发展提供一个背景,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表现阶级或民族矛盾,时代或社会主题。”^{(12)(P41-45)}从20世纪的乡土想象系列来看,这种概括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在各个时期,作家对于乡土的启蒙内容并不完全相同,而是各有偏重。有人对此作了大致区分:“五四”时期和新时期文学比较注重改造国民灵魂主题,20年代乡土文学流派及80年代部分作品则更注重乡土礼俗批判主题,40年代至60年代的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作家则更注重人物性格弱点批判主题。80年代至90年代则以家族制度批判主题为主。”^{(13)(P19-24)}

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以城市为参照系,大力推进经济建设成为主旋律,这时的乡土想象更多的是一种乡土对现代性的单向度诉求。这种单向度的写作是由于中国作家一贯受到政治等意识形态影响,不能摆脱“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束缚,在现代化的感召下,“一元论”思想便统治了作家的头脑,作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显现出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这种对立模式就是将乡土与城市视为对立的两极,认为乡土经济要发展除了向城市看齐之外别无出路,否则只能死守贫穷,所以,以城市生活为准则成为乡土想象的基调。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作家也发现了乡土在向城市转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困惑、迷茫,但都认为这是前进中的曲折,是改革路上的阵痛,是现代性过程中必须克服的困难。有人说“从《陈奂生上城》到《人生》、《浮躁》、《哦,香雪》及至《老井》、《黑骏马》等等,新时期的中国乡土小说或隐或显地贯穿着一条城乡对立主题的线索,并且在这种对立中,城市及其所表征的文明体系自明地成为乡土文明现代转化的理想形态和确定方向,尽管其间也会经历种种文明转化的失落痛苦。”^{(14)(P66-72)}

随着经济改革的启动和逐步深入,作家们纷纷将历史反思的目光转注当下,着力书写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这在根本上决定了“改革小说”以改革/反改革(保守)的“二元冲突”作为其主导性叙事模式。即使是《陈奂生上城》(高晓声)和《乡场上》(何士光)、《黑娃照相》(张一弓)等未曾书写“改革/反改革”的正面冲突的“改革小说”,实际上也隐含着改革前/后的对比模式并以此歌颂当时的改革路线。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小说正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历史情境下的启蒙言说,它们的叙事目的主要还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实践进行“文学”的论证。

对于启蒙之于现代性的意义,《剑桥中华民国史》有一段概述很到位:“在中国,这一关于现代性的新概念似乎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人所共知的几种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性观念:进化与进步的概念,历史向前运动的实证主义信念,对科学与技术的有益的潜力的信心,以及广阔的人文主义框架中的自由与民主的理想。”^{(15)(P561-562)}由于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离不开乡土,对于现代作家来说,“改造国民性”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广袤的乡土需要他们的启蒙。

三、启蒙引导乡土现代性反思

在现代化不断推进的途中,一种反现代性思潮也相应地出现了。如艾恺认为,当启蒙运动推进现代性之后,也为世界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他说“启蒙运动不但改变了欧洲的世界观,由于其本身即包含了‘道德真空’的基因,遂为日后‘价值失落’、‘没有目的’与‘无意义的世界’播下了种子。”^{(4)(P10)}查尔斯·泰勒认为现代性有三个隐忧:“第一个担心是关于我们可以称作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的东西。第二个涉及在工具理性猖獗面前目的的晦暗。第三个是关于自由的丧失。”^{(16)(P12)}对现代性的反思,也是推动现代性的一种动力,现代性正是在这种质疑与反思中不断破冰前行。

在20世纪的中国,有人说“‘五四’文化革命伟大功绩之一,即是对儒家仁义道德思想和传统礼教本质的‘人肉筵席’的发现,由此划出了现代化意识与传统观念的一条分界线。”^{(17)(P284)}然而,当这条分界线被划出来后,知识分子却并不感到轻松,因为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知识分子猛然发现,现代性不仅仅带来了希望,还带来了许多弊端。一旦跨入到现代性的时代列车上,知识分子却又在现代性的利弊之间痛苦徘徊和艰难选择。

在“五四”初期,新文化主将们借助现代启蒙武器以激进的态度进行文学革命,倡导反帝反封建的平民文学,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其实可说只是批判。在革命最初阶段,对传统的反思是不全面的,它只着重于批判不合理的东西,而忽视了其合理的内核。随着时间的流逝,作家们逐渐感到启蒙与救亡的艰难。鲁迅先生在猛烈的呐喊后,“其叙述起点由《呐喊》中对传统的控诉转向对一代叛逆者的质询……《彷徨》确立了新文化的另一重要主题,即对社会变革艰巨性、曲折性与复杂性的预示和对先驱者社会行为的判断。”^{(18)(P153-159)}现代工业文明进入乡土,强迫中国进行现代化,它打破了封闭的小农经济,造成了乡土农业的破产,剥削和压迫也随之而来,同时,现代

工业文明也给原本纯净的乡土带来了精神上的污染,重利轻义、颓废堕落伴随现代性的到来而产生。一些思想深刻的知识分子发现了现代性的弊端,于是,他们再次以启蒙的姿态引导大众反思现代性。

沈从文曾说过“现代物质文明带给湘西表面的繁荣,一是金钱逐渐取得了对人与人关系的支配,人们道德的沦丧和朴素人性美的消失。”^{[19](P78)}都市文明对乡土文化的同化,使沈从文失落了自己又认识了自己。沈从文被认为是反现代性的,事实上,沈从文的一切生活都已经现代性了,他的都市写作、办报、教书就是现代性的生活,沈从文的反现代性,只是针对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现代性而采取的一种保留姿态,而不是反对一切的现代性的方式,他追求的是一种中国的老庄哲学与西方的浪漫主义相暗合的自然哲学精神。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也是现代性的另一种方式,是对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性的一种补充和丰富。

在启蒙与救亡阶段,甚至建国后的现代化建设阶段,人们更多地是把现代性作为一个进步的整体来看的,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民族的振兴。但经历现代化之后,人们不再把现代性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而是看到了现代性某些方面的不足。有人说“如果说‘五四’时期作家们大都对现代性理论采取了整体主义的态度的话,那么,随着20世纪历史进程所呈现的曲折,一些作家开始意识到现代性实践过程中本身所包含的对现代性的压抑、异化。”^{[20](P55-60)}丁帆认为,在1979年—1984年乡土小说中,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困惑两难的情结,“这就是一方面对于旧文化的眷恋,表现出一种‘怀旧’的‘情结’;另一方面又对现代文明与文化进行追求,表现出一种‘喜新’的‘期待’。”丁帆分析了郑义《老井》中孙旺泉和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两个人物形象,认为这两个人物形象“都不约而同地有一个现代化和传统化的象征对应物相互撞击的现象出现。由这两种人物性格(实则是两种文化形态)的撞击而形成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分裂状态,似乎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心理发展到这个时代的一个整体象征。”^{[21](P389)}这说明,知识分子意识到了现代性与乡土传统的矛盾冲突,他们试图用文学来阐释这种矛盾冲突,以求寻找到一种解决的办法。

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随着市场经济对乡土农村的挤压和外务工农民遭受到的苦难日益加剧,齐格蒙·鲍曼所说的现代性的“残暴”在乡土中就日逐凸显,现代性对乡土的“暴力”凸显,进一步显示了乡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样,20世纪90年代后,乡土想象表现了现代性的复杂性和艰难性,进而对迷信于现代性神话的大众再度启蒙,使大众清醒认识到现代性不可避免地带来的一些不可调和性。

第一,物质与精神的不可调和性。作家的疑惑表现在对经济与道德两难抉择的表述上,“经济能人”的道德堕落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乡土想象惯常的叙事模式之一,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等。而这一模式的设置已经流露出作家的隐忧,忧虑现代化发展的道德危机。如关仁山的《天壤》展示了农耕文明脆弱的生命,面对肆意扩张的工业文明,传统的农业文明岌岌可危,农民迅速失去耕作的土地,钟情于土地的农民韩成贵半年

的辛劳顷刻间灰飞烟灭。这种巨大的差异似乎昭示人们,农民要谋生存求发展,必须告别古老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俯首称臣。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指出的那样,商品经济的发达、物质上的进步必然带来精神的失落和道德的堕落,如关仁山的《九月还乡》中的九月、孙艳等纯朴秀美的女子外出打工遭遇“不脱裤就解雇,不解雇就脱裤”的困境,不得不走上卖身之途。

第二,现代性剥夺生命的尊严。这种失去生命尊严的现象,在乡土想象中一般以“躯体丧失”的形式被隐喻出来。《九月还乡》中小木匠云舟“被城里人打折一条腿”,张冀雪《新麦地》中进城打工的农民祁三娃在城市中被抢劫丧生,他们的悲剧暗示着触目惊心的城市掠夺。阎连科《日光流年》中的三姓村人没有一个能活过40岁。为解开这道命运的符咒,三代村长带领村民种油菜、深翻换土、凿渠引水,为此全村老少付出了超乎想象的巨大代价——男人到烧伤医院出卖大腿上的皮肤,女人赶赴城市出卖肉体,从紧扼咽喉的死神手中争分夺秒以最原始、最悲怆、也最坚韧的方式与自然进行了一场愚公移山式的抗争。阎连科似乎要刻画一个关于人与自然对抗的古典命运悲剧的现代版本,三姓村人付出难以计算的牺牲终于引来了的灵隐清溪,却是被现代工业社会污染得肮脏不堪的一渠臭水。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悲壮遭到了无情现实彻底的解构,人原初的生命意志换来的却是另一场致命的毁灭。《受活》的柳鹰雀,在乡土现代性追寻的道路上,失去了一条腿,这意味着乡土的现代化建设正在跛行。

第三,乡土的生命力正在减弱。莫言就以《红高粱》的隐喻世界,暗示在现代性过程中,乡土生命力的丧失,作者将现代的孙辈比作劣质、杂芜、苍白低矮的“杂种高粱”。如果说,卑劣孱弱的不肖之子在《红高粱》中尚且是隐匿的形象,那么,到了《丰乳肥臀》作者有更为细致的描写,那个永远长不大的上官金童正是现代人的具象体现。由此可见,“生命力”的主题在莫言这里同时包含着一个深刻的“文化批判”的主题。当现代文明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削弱了生命力的时候,到底这种进步该以何种眼光看待,莫言与“寻根派”作者的一般立场不同,他未以理智上的二分辨证来看待这个问题,换言之,他没有以简单的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待现代文明的发展历程,没有将文明划分为进步/保守的单一模式,而是把文明搁在生命力的对面,揭示出在文明的烛照下,生命力是如何衰颓以至于走向萎缩的。由此反映出现代人一个普遍的生存困境。莫言的作品,似乎要表明在闭塞的偏僻的乡土,由于同主流文化思想的疏离,人们反而保留了较多的生命活力。

知识分子的启蒙曾经引导大众向往现代性,然而,在意识到现代性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类最美好的未来后,知识分子又迫不及待地告诫大众要谨慎对待现代性,乡土想象就是在这种关于现代性的追求与反思中不断深化其内涵。

[参考文献]

- (1) 福柯. 什么是启蒙 [A]. 汪晖等. 文化与公共性 [C].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 (2) 汪晖. 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A]. 汪晖自选集

- (C).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3) [法]伊夫·瓦岱. 文学与现代性 (M). 田庆生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4) [美]艾恺. 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 (5) 王一川. 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 (6) 张颐武. 现代性的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 (J). 战略与管理, 1994 (3).
- (7) [美]詹姆斯·施密特.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 (M). 徐向东、卢华萍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8) 胡书庆. “桃源”梦: 现代作家的乡土之恋 (J). 郑州大学学报, 1996 (1).
- (9) 徐剑芝. 中国人的乡土情结 (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3.
- (10) 鲁迅.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A). 鲁迅杂文全集 (C).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4.
- (11) 许道明. “乡”与“市”和中国现代文学 (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2 (1).
- (12) 金汉. 中国乡土小说的艺术新变——新乡土小说论 (J). 当代文坛, 1993 (6).
- (13) 周海波. 论 20 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主题的理性内涵 (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3 (4).
- (14) 韦丽华. 20 世纪末的乡土现代性反思——近期乡土小说的一种解读 (J). 福建论坛, 2000 (1).
- (15) [美]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 (M). 杨品泉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16) [加]查尔斯·泰勒. 现代性之隐忧 (M). 程炼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17) 朱寨、张炯. 当代文学新潮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 (18) 刘彦君. 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悲剧论 (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1 (S1).
- (19) 沈从文. 从文自传·附记 (A). 沈从文文集 (第 11 卷) (C).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4.
- (20) 黄万华. 原乡的追寻——从一种形象看 20 世纪华文文学史 (J). 人文杂志, 2004 (4).
- (21) 丁帆. 新时期乡土小说与市井小说: 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解构期 (A). 文学的玄览 (C).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8.